



## 孔教运动的再估价 (2005-6-29 16:26:51)

作者：颜炳罡

谭嗣同、唐才常等虽然认为吾儒可以称教，但他对旧有的、当时流行的孔教十分不满，因而要借助基督教的形式对它进行根本改造，实现其真正宗教化。面对基督教之盛况，谭嗣同分析孔教不振之缘由：

孔教何尝不可徧治地球哉！然教则是，而所以行其教者则非也。无论何等教，无不严事其教主，俾定于一尊，而牢笼万有；故求智者往焉，求财者往焉，求寿者往焉，求医者往焉。由日用饮食之身，而成家人父子之天下，寤寐寤兴，靡纤靡巨，人人悬一教主于心目之前，而不敢纷驰无定。道德所以一，风俗所以同也。中国则不然，府厅州县，虽立孔子庙，惟官中学中人，乃得祀之；至不堪，亦必纳数十金鬻一国子监生，始赖以骏奔执事于其间。农夫野老，徘徊观望于门墙之外，既不睹礼乐之声容，复不识何所为而祭之，而已独不得一与其盛，其心岂不曰：孔子庙，一势利场而已矣。如此，又安望其教行之哉？<sup>4</sup>

谭氏认为，孔教之不振，第一，因为孔教只是“官中学中”之教，只是一势利场而已，与百姓无关。第二，对孔子未能做到“定于一尊，而牢笼万万”。在西方，人们不论学问，还是疗一疾，得一钱，必谢曰：“此耶稣之赐也”。这并不表明西人愚昧，因“事教主之道，固应如此也。”正因如此，基督教势力日大。中国未能严事其教主孔子，乃至邪说横行，孔道日削。他说：“小民无所归命，心好一事祀一神，甚且一人祀一神，泉石尸祭，草木神丛，而异教乃真起矣。”<sup>1</sup>谭嗣同找到了中国民间信仰多神崇拜的症结所在。因为儒学是士大夫的信仰，最终使孔庙成为一势利场，乃至小民无所归命，只好“一事祀一神，甚且一人祀一神”，形成了民间多神崇拜乃至泛神崇拜的现象。而打破这一官民悬隔，读书人与农夫野老之悬隔，化儒教为全民之教，孔教才能发扬光大。

谭嗣同、唐才常等人与康有为一样，认为基督教之所以盛，孔教之所以“几几不足与族之耶稣衡”，除没有广教会之外，还有一重要原因：“彼教主耶稣以纪年焉，而师有统，我则不能教主孔子，又不以纪年，而师无统也”。<sup>2</sup>中国一向皇帝的年号纪年，西历是以耶稣诞辰纪年，唐才常等认为中国是有君统而无师统，而君统万万不能与师统争胜，此孔教之不倡也。故他们主张以孔子纪年取代皇帝纪年。

谭嗣同指出，孔教何止不昌，乃至孔教精神已亡。由此，他将批判的锋芒直指封建君主及献媚君统之伪学，直指满清王朝。他说，罗马教皇者出，借耶教之说，而行私天下之实，任意发动宗教战争，战死者数百万人，迄路德党盛，教皇始厥。“故耶教之亡，教皇亡之也；其复之也，路德之力也。孔教之亡，君主及言君统之伪学亡之也；复之者，尚无其人也。吾甚祝孔教之有路德也。”<sup>3</sup>他公然诅咒满清皇室是不识孔教而凭其蛮野凶残之本性而窃取中国的贱类异种，是孔教之罪人！而中国有识之士，抱亡教之忧，仿西人创孔教堂，以传孔教，却遭到他们的封杀。“故强学会诸君子，深抱亡教之忧，欲创建孔子教堂，仿西人传之法，遍行于愚贱。……不知此举适与愚黔首之意相反，故遭禁锢。”<sup>4</sup>正是“传耶稣教则保护之，传孔子之教则封禁之，自虐其人以供外人鱼肉，中国人士何其驯也！”他对清政府表示了强烈的愤慨和孔教改革的热切期盼！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谭嗣同与康有为虽然都主张保卫圣教以对抗耶教的入侵，但二人有很大区别。康有为孔教改革是服务或服从于他的政治整体设计的，或者说孔教改革是他社会改革的有机部分。正象他的政治改革是为了挽救清政府的命运一样，孔教改革是挽救清政府全面危机的组成部分，康有为要依靠清政府的行政机构通过自上而下的变革来达成其目的，所以在他那里，孔教改革没有独立意义。而谭嗣同不然，他认为爱新觉罗氏是不识孔教之贱类异种，清政府只是借孔教之名以行愚民之实，不会真心推行孔教，孔教改新不能依靠清政府，而是唤醒“孔教之路德”。在谭嗣同看来，而孔教是与君主、君统是对立的，君统存而孔教亡，而孔教兴，君统亡。所以在强学会受到清政府的严禁之后，作为一位与强学会毫不相干的局外人，“见事理失平，转思出而独逢其祸。”与英国驻汉口领事贾礼相约，组织强学会湖南分会，“假耶稣之名，复欲行孔子之实。”<sup>5</sup>这是路见不平，仗义执言的精神，反映了谭嗣同与当局不妥协的大无畏气概！

谭嗣同、康有为等都力图模仿耶教以实现孔教的职能转变和根本变革，最起码使儒教由士大夫之教开放为全民性之教。但谭、康诸人虽敬重耶教，但坚决反对以耶教代替孔教在中国地位，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的孔教运动是从根本保

孔教以对抗耶稣教的运动。在价值层面上，他们认为孔教高于耶教。谭嗣同说：“佛教大矣，孔次大，耶为小。小者先行，次宜及孔，卒乃及佛，此其序矣。”<sup>6</sup>这一顺序与梁漱溟对西、中、印文化评判的顺序完全相同，耐人寻味。康有为也说：“有以神道为教者，有以人道为教者，有合人神为教者。要教之为义，皆在使人去恶而为善而已。”“而佛耶回乃因旧说，为天堂地狱以诱其民。”“孔子恶神权而扫除之，……治古民用神道，渐进则用人道，乃文明之进者。故孔子之为教主，已加进一层矣。”“乃真适合于今之世者”。<sup>1</sup>孔教为人道教，是文明教，合乎孔教本然面目，以此研判孔教高于耶教也具有相当的说服力。但这与康氏神化孔子的做法却极不协调，顿起冲突，而康氏不自知，令人叹惜！

### 三、

百日维新失败，康有为惶惶出逃，谭嗣同壮烈牺牲，孔教运动夭折了。谭嗣同的鲜血向世人宣告：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使中国由君主专制转变为资本主义近代化国家的道路走不通！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也结束了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政体。孙中山基本上是位西化主义者，对孔教没有兴趣，理论巨匠章太炎与康有为的学术观点迥然异趣，尤恨康氏孔教理论之荒诞，而梁启超也由早期孔教之猛将变成孔教之大敌。由维新失败到辛亥革命成功，十多年的时间里，运用什么方式去改变中国的现状，或者说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中国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话题，孔教问题没有引起人们太多的关注。

1912年1月19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部颁布法令，正式宣布小学废止读经。7月10日，教育部召开全国临时教育会议，主张废止尊孔并提出学校不拜孔子案，大学废除经科。小学不再读经，大学不设经科，学校不尊孔子，可谓“两千年未有之变局”。清末，废除科举，经诵犹在，孔圣地位犹存，但教育改革则直接动摇了儒家在中国文化领域的主导地位。美国传教士丁义华说：“民国第一任内阁教育总长蔡元培，逞其一偏之心思，欲为惊人之创举，昌言废孔，废孔于是丁祭不准举行，学校不许拜孔，学田学产没收入官，举中国数千年来尊无二上之至圣先师，例诸淫祀妖庙，禁绝无余，”“当时之士，莫不痛心疾首，然怵于政府之威严，大都敢怒不敢言，蔡氏去位，此案全翻，未几而孔教出焉。”<sup>2</sup>由于传统的轰然崩解，导致了許多迷恋儒学人士的强烈反弹，在政治上已无所作为的康有为，顺应这一社会心理，专而全力从事孔教运动，民国初年，孔教运动勃然而兴。主要表现如下：

（一）孔教组织在全国各地纷纷建立。1912年12月，陈焕章、王人文、姚丙然、沈守廉等上海成立孔教会，同年，王锡藩、刘宗国等在山东创设孔道会，饶智元、恽毓鼎等成立孔社，杨士琦、谭人凤等组织昌明孔教社，贺寿煦、殷炳继等组织孔道维持总会。1913年9月，沈维礼、沈士成等创设寰球尊孔总教会，同年9月，许棣常、李安国等在东京成立孔教会东京支会，1914年3月，冯国璋、周嵩年等在北京成立孔道总会，等等。孔教会、孔道会、孔社、经学会等等，名虽有异，对孔子学说的理解也未必全同，但尊崇孔子，昌明孔学之旨则完全一致。

（二）创办宣传孔教的舆论阵地，扩大孔教的影响。1913年2月，陈焕章创办《孔教会杂志》于上海，3月，康有为主编的《不忍》杂志也在上海创刊，成为宣传孔教运动的重要舆论工具。

（三）发起定孔教为国教的请愿活动。几千年来，孔教虽无国教之名，但有国教之实。然而废科举，废大学经科，废小学读经，废祀孔，国教的地位已不复存在。先是广东人士廖道传上书大总统请定孔教为国教，1913年9月，孔教会代表陈焕章、严复、夏曾佑、梁启超、王式通等上书参议院、众议院，请定孔教为国教，并请两议通过，黎元洪发出请颁孔教为国教电，刘次源请尊孔教为国教电、孔教会东京支会请速定孔教为国教致大总统呈。一时间，函电叠至，定孔教为国教呼声甚高，但这一提案最终未能在两院通过。

1913年3月，袁世凯出任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尊孔，但不赞成康有为孔教新说。1913年6月22日，袁世凯发布尊崇圣令，1914年9月28日，又率官员在北京孔庙举行“秋丁祀孔”礼。需要指出的是，袁世凯之尊孔令也罢，祀孔令也好，与康有为、陈焕章等人孔教运动并不完全等同。就尊孔而言，袁世凯与康有为是一样的，但袁世凯认为孔子不是教主，认为孔学不是宗教，这与康有为区别开来。1914年6月《教育部为订定崇经尊孔教育方针致大总统呈》中说得很明白：“微论孔圣，未可附会宗教之说，以相比伦。而按之国情及泰西宗教之历史，均难移植，致失孔道之真，而启教争之渐。”<sup>1</sup>这个致大总统呈完全是揣摩袁氏之意而作，很能反映袁氏政权既尊孔，又反对孔子宗教化的复杂心态。尊孔，可以安抚旧派人士，而反对定孔教为国教，总算给提倡信仰自由的新派人士做了个交待，老谋深算的袁世凯在孔教问题上可谓费尽心机，耍尽手段。

